

学习鲁迅深入批邓

一九七六年八月

说 明

这份材料是根据我馆1976年7月举办的《学习鲁迅深入批邓辅导讲座》的记录稿整理。根据听课同志们的要求，加以付印，供学习参考。

首都图书馆

鲁迅反复辟反倒退 的光辉一生

鲁迅的一生是坚持前进，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反对倒退光辉战斗的一生。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新民主主义论》）今天我们回顾鲁迅一生反复辟反倒退的光辉战斗业绩，总结他宝贵的斗争经验，重温他许多精辟的论述，对于我们把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鲁迅生于1881年，于1936年逝世，终年56岁。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受的是封建文化的教育。但是，他对这些封建文化教育很反感，后来他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

干。”（《坟·写在坟后面》）

鲁迅诞生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使国家、民族处在风雨飘摇中，人民生活贫困不堪。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因故下狱，后来父亲又得了重病，家境非常困难，有三年多的工夫，鲁迅几乎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从比他高一倍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和他一般高的柜台上去买药。家庭的破落使鲁迅亲自尝到世态的炎凉，他后来总结说：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涂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鲁迅对那黑暗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了解。鲁迅的外婆家在农村，鲁迅小时候经常到外婆家去，这样也使他有机会亲眼看到农民的痛苦生活。这一切激起了少年时代的鲁迅要拯救祖国、拯救民族的强烈愿望。于是鲁迅决定打破家乡破落人家子弟做幕僚或经商的老例，要“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十八岁那年，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学习。在南京学习期间，他接触到了新思想，听到和见到了以前在封建牢笼里所没有的哲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如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著作）。从这本书中，鲁迅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发展观，认为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进化论思想成为他支持新生事物、反对顽固势力，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种思想武器。1902年鲁迅到日本学医，他说：立志学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鲁迅想通过学医促进中国社会的改革。但是不久，这个愿望就被现实打破了。一次他从电影里看到一

个中国人将被日本人杀头，周围“鉴赏”这“盛举”的竟是中国人的身体不好，主要原因是精神麻木，因此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这样他弃医习文，想用文学来唤醒民众，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为祖国的光明未来而斗争。在日本，鲁迅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非常赞助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参加了光复会。当时鲁迅写了一些文言的科学和文艺论文，介绍西方的进步思想，抨击中国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文化，并翻译了《域外小说集》。1909年回国以后，先后在杭州和绍兴教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这场革命，热情参加了这场革命，带领绍兴的学生武装演说队上街游行，欢呼绍兴的光复。1912年2月鲁迅应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五月鲁迅随教育部搬迁到北京。但是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政府机构里把旧官场种种腐败恶习全部继承下来，教育部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旧官员之间互相排挤，互相倾轧，使鲁迅非常厌恶。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鲁迅一度陷入苦闷，在这一段时间里，鲁迅利用空余时间，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和解剖，他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抄古碑，看拓片，这样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文化对人民的毒害。毛主席说鲁迅会杀“回马枪”，鲁迅自己也说：“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坟·写在〈坟〉后面》），这时期鲁迅表面是沉默的，但他的内心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满腔烈火。他相信新的革命一定会到

来，革命的“惊雷”一定会炸响。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鲁迅很大震动。他开始觉得中国这所黑暗的“铁屋子”有了毁坏的希望，他从革命的“刀光火色”中，看到了人类“新世纪的曙光。”

由于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出现了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合成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向中国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开战。他们鲜明地提出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宣扬复古思想的文言文，反对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伦理，提倡新道德、新文学。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毛主席说：“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正是在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斗争中，鲁迅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走在时代的前面，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成了新文化运动和整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这时期鲁迅的光辉战斗业绩，就在于他高举了当时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他早在五四运动前夕，1918年就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对封建旧道德——孔孟之道和封建旧文学——宣扬孔孟之道的文言文的不要妥协地宣战书。《狂人日

记》以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大量的小说、杂文作品，象连珠炮似的向旧道德、旧文学开战，给孔孟之道以摧毁性的打击，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塑造了一个惨遭迫害而又开始觉醒的反封建战士狂人的形象。他通过狂人的不幸和反抗，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封建礼教的残酷。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把数千年剥削阶级社会概括为“吃人”两个字，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残酷的本质。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在1918年8月又写了杂文《我之节烈观》，对反动的节烈观进行了无情的鞭鞑。鲁迅指出那些高喊“节烈”的人是什么男盗女娼的事都干得出来的。说他们“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之一”。而且他们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家眷去作节妇或烈女的，如果有个青年女子，你说她将来要成为烈女，那她是不答应的，她的父兄也不会和你罢休。这就充分暴露了“节烈”观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鲁迅指出：节烈观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压迫、残害妇女，反对妇女解放的一种毒辣手段。

一九一九年八月，鲁迅又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对封建“孝道”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指出：什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统统都是胡说八道（曲说），是退婴（退化）的病根。鲁迅说：“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大家知道，单细胞分裂为多细胞，多

细胞发展成为低等生物，低等生物发展为高等生物，直到动物、猿猴、类人猿最后人类。如果单细胞也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它就永远不敢分裂繁殖，多细胞永远也没有，没有多细胞，低等生物也就没有，那么高等生物、动物、猿猴以至于人类都不会出现了。鲁迅深刻的指出，所谓“孝”、“烈”这类道德，是“一味收拾孺者弱者的手段”，号召人们起来，摧毁这吃人的制度。“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坟·我之节烈观》）。

以上讲的是鲁迅对封建旧道德的批判。

对旧文学，鲁迅是集中揭露“国粹主义”的荒唐。（《随感录35、39、45、57、59》）。

反对旧道德和反对旧文学是密不可分的。革旧文学的命，在当时主要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因为文言文几千年来，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垄断，为他们宣扬封建的旧道德忠实地服务。要打倒孔家店就必须在思想革命的同时，进行语言形式的革命，要求废除封建古老的文言文，建立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工具。《新青年》从1918年5月开始，完全改用白话文，此后白话文刊物在全国风起云涌。但是，正象维护封建旧道德一样，封建顽固派死抱住文言文不放。当时以封建余孽林琴南为代表，形成了所谓“国粹派”，说什么文言文是我国的“国粹”，是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绝不能放弃；而白话文则“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是下等人，泥腿子说的话，不能登大雅之堂。如果大家都用白话文作文章，那么“都下引车卖浆之徒”和“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这还成什么体统！他们嘲笑提倡白话文的人是因为不懂文言，以“自文其陋”，但是，早已宣布过“中国国粹”、“等于放屁”的鲁迅，在

他的大量“随感录”中，以犀利的笔锋，对这些国粹主义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鲁迅说：你们说提倡白话是鄙俚浅陋……这不用说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随感录57》）。鲁迅辛辣地讽刺了国粹派正人君子的丑态。对国粹家奉为至宝的“国粹”，鲁迅也作了深刻的剖析。鲁迅说：“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热风、随感录三十五》）。但是，在那些国粹主义者看来，却是“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热风、随感录二十九》）鲁迅愤怒地说这些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偏要抱着“僵死的语言”，称他们是“‘现在的屠杀者’，他们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热风、随感录五十七》）鲁迅自己以写白话文的实际行动捍卫新文学，狠狠打击了维护文言文的尊孔复古派，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鲁迅在“五·四”时期，高举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向着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国粹派”，“道德家”，封建的遗老遗少展开了猛烈进攻，无情地鞭鞑了封建

道德和封建文化，战绩辉煌，不愧为“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

二、痛击“尊孔读经”复辟逆流的中流砥柱

五四运动以后，革命的形势迅速高潮。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蓬勃开展，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一九二三年爆发了“二·七”大罢工，一九二四年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一九二五年爆发了“五卅”大罢工。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是，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势力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就能扫除掉的。因此五四运动的风暴刚过，北洋军阀政府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就掀起了“尊孔读经”的浪潮，这是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他们要翻五四运动的案，算五四运动的帐，向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这个复辟逆流的急先锋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御用文人“学衡派”和“甲寅派”。“学衡派”的骨干分子是南京大学的教授胡先骕、梅光迪、吴宓等人，他们大多留学美国，因此摆出一付博古通今、通晓中外的“权威”架势，声称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来“衡量”中国思想文化。他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新知”来维护封建主义的“国粹”，这些人实际上是穿着西服的封建卫道士。于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结合起来向新文化发动了疯狂的进攻。“甲寅派”的代表是章士钊，他当时是一个反动官僚，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他公开鼓吹“尊孔读经”，赤

裸裸地宣扬“读经救国”，直接为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服务。“学衡派”“甲寅派”用文言写了大量宣扬复古倒退的文章，造复古倒退舆论。这还不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尊孔读经法令，规定小学四年级开始读经，强迫人民遵照执行。

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队伍本身也发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对于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十分害怕，五四运动的高潮还未过去，他们就一头扎进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怀抱，和学衡派、甲寅派那些封建御用文人坐到一条板凳上了。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开始，胡适就相继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进研究室”等种种反动口号。所谓“少谈些主义”，就是少谈些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借以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妄图阻挡革命洪流。所谓“整理国故”，就是整理那些宣扬孔孟之道的老古董；所谓“进研究室”，就是让青年脱离现实，逃避斗争。由于胡适一开始曾经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他在青年中还有一定的迷惑性。他就利用这一点以青年“导师”自居，又是发表讲话，又是开列书目，又是撰写文章，处心积虑把青年引入尊孔复古的死路。他给青年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就包括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等达二百多种，一千多册。

在这一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面前，鲁迅扛起了反复辟的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迎头痛击了这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

鲁迅揭露反动派和他们的走狗文人一再宣扬尊孔读经的反动目的。鲁迅说：“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

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要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要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另外鲁迅对“学衡派”和“甲寅派”文章中的文理荒唐，逻辑混乱或用典故错误之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嘲笑。比如学衡派的一篇诗《渔丈人行》，为了押韵，把“复巢之下无完卵”这个典故篡改成了“复巢之下无完家”，鲁迅说：“这‘无完家’虽比‘无完卵’新奇，但未免颇有语病。假如‘家’就是鸟巢，那便犯了复，而且‘之下’二字没有着落，倘说是人家，则掉下来的鸟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鹏金翅鸟，断没有这样的大巢，能够压破彼等的房子。”如果只是为了押韵，那“无完瓜”、“无完叉”也可以。鲁迅蔑视地称他们不过是“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量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说他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热风·估“学衡”》）， “甲寅派”的文章同样有许多狗屁不通之处，所以鲁迅说他们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要开头，他们还得有一个更通古学，更长古文的人才能胜对垒之任。鲁迅就是这样无情地揭露了“学衡派”、“甲寅派”的荒唐可笑。鲁迅深刻地指出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吹嘘卖弄的中国所谓“古文明”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而“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所以要拼命宣扬这个“古文明”，不过是要让这个肉肉的筵宴永远摆下去；

而那些帝国主义分子所以要称赞这个“古文明”则是要“喝中国人民的血”，要让中国“永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尝鉴”。（《坟·灯下漫笔》）对于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鲁迅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未有天才之前》、《导师》、《青年必读书》、《一点比喻》等杂文中，愤怒地撕下了他们的学者、导师外衣，还了他们为虎作伥的反动面目。鲁迅把他们比之为“脖子上挂着铃铎”的带头“山羊”，妄图把青年引进孔孟之道的死胡同。鲁迅说：“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华盖集·导师》）

在和形形色色的复辟派的斗争中，鲁迅号召人民，特别是青年起来斗争，反击复辟逆流，创造幸福的未来。鲁迅说，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什么“整理国粹”、“多研究问题”，而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何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他号召青年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灯下漫笔》）。鲁迅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五》）就是说在这黑暗的社会里要敢于造反。要创造从未存在过的“第三样时代”。

在和形形色色复辟派斗争过程中，鲁迅还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教育人民要把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

底，在写于一九二一年的不朽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鲁迅如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封建复辟派的篡夺革命果实而导致的失败：“如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而这些复辟派掌权以后，就凶相毕露，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要求革命的阿Q就被他们当作“惩一儆百”的“示众”材料而推上了断头台。阿Q的悲剧形象地展示了革命政权遭到篡夺后革命人民的悲惨命运。告诉人们一条真理：复辟对于革命人民是死路一条。

鲁迅积极参加现实斗争，积极支持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活动，尤其在“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同反动政府走狗文人和一切复辟倒退势力作了不调合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的“女师大事件”是这样引起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走狗，她在学校积极推行封建奴化教育，以封建家长自居，任意地迫害学生，激起了学生的反抗，发生了驱逐杨荫榆的学潮。她仗着北洋军阀政府撑腰，竟非法开除了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会干部的学籍，鲁迅当时在女师大任课，对此感到十分气愤，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他和许寿裳两人合写了一篇《对于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严正声明对女师大事件的态度，但是北洋军阀政府竟大打出手，残酷镇压这次运动，对女师大停水、停电。下令解散女师大，还雇佣了一批女流氓以“接收”为名，殴打学生，把学生强行拖出校外。这时，北洋军阀的走狗文人《现代评论》派的干将陈西滢又跳出来帮他主子的忙，发表什么《闲话》，貌似公允地说，女师大搞得太不象样了，“丢尽了教育界的面目”，说鲁迅“未免偏袒一方”说我们“还是不相信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

潮”。实际上是影射鲁迅，暗中鼓动北洋军阀政府迫害鲁迅。鲁迅没有被吓倒，当晚就写了一篇《并非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陈西滢之流貌似公允的假面具，说他们这些正人君子实际上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

“丢尽教育界面目”正是这一伙“蛆虫”。这时候“五卅运动”爆发了，上海20万工人罢工，全国各地都纷纷响应，女师大学生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斗志更加高昂，他们坚持斗争，毫不妥协，在校外找了房子坚持上课，鲁迅不怕打击，到小胡同给他们上课。在全国政治形势压迫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撤换杨荫榆，罢免章士钊，女师大复校，斗争取得了胜利。通过这场斗争，鲁迅认识到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凶狠残暴，卑鄙无耻，因此，当林语堂、周作人等人鼓吹“中庸之道”，提倡“费厄泼赖”，主张“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的时候，鲁迅则义正词严地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再一次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鲁迅说狗是会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以后一有机会还是咬人。所以凡是咬人的狗，不管是在岸上的还是落水的，都在要打之列。鲁迅自己说这篇文章是用他的同辈人和比他年幼的青年们的血写成的。在这篇文章里鲁迅提出了“痛打落水狗”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号召人民对反动派要穷追猛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就在鲁迅这篇文章写成后不到三个月，“三一八惨案”就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串通一气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大屠杀。当时倾向革命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封锁了大沽口，日本帝国主义见张

失败，军舰开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也开炮还击。日本帝国主义竟向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提出所谓“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停止军事行动。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竟然要求中国停止军事行动，真是岂有此理！中国人民气愤极了，中国的主权绝不允许帝国主义践踏。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市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会后向军阀政府请愿，结果段其瑞竟下令开枪，群众死40人，伤150人，造成惨绝人寰的“三一八惨案”。其中刘和珍、杨德群——女师大学生也壮烈牺牲。大屠杀的消息传来，鲁迅怒不可遏，当晚怀着愤怒的心情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一文。鲁迅说：“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鲁迅写道：“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鲁迅把三一八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之流却按照他们主子的旨意、歪曲事实，制造流言，诬蔑学生是“受人利用”，“自蹈死地”，妄图为他们的反动主子开脱罪责。反动派的残暴、走狗文人的无耻，使鲁迅义愤填膺，鲁迅拿起笔，写下了《死地》《可参与可笑》《纪念刘和珍君》《空谈》等一系列战斗文章。鲁迅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他还说，“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鲁迅说他万万没有料到陈西滢之类的“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三一八惨案对鲁迅精神刺激很大，他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四十名青

年的血和生命使鲁迅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残酷，进化论怎么能解释这种现象呢？鲁迅对自己的进化论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动摇，他在“无情地解剖自己”，后来他把1907——1925年的杂文编成集子，取名《坟》，用鲁迅自己的话讲其意是“一面埋藏，一面也是留恋。”鲁迅要埋葬思想中错误的东西，向过去告别，所谓留恋就是要珍惜以往的斗争历史和经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三一八惨案后，反动政府加紧了反革命专政，大批逮捕革命群众，他们对鲁迅迫害也越来越紧，在第二批“通辑令”上就有鲁迅的名字，在朋友的劝告下，鲁迅只好暂时离开寓所避难，就是在避难中，鲁迅也没有停止战斗，这一时期，他继续写杂文和反动当局和这股反动的复辟逆流，和这些要把新生力量置于死地的刽子手进行斗争。

这时南方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军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为了避开北洋军阀的迫害，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鲁迅于26年8月离开了沉闷的北京，到厦门大学。到厦门后，不断听到北伐军胜利的消息，精神振奋，但是后来鲁迅就失望了。学校非常陈旧，腐败，校长和反动当局，走狗文人都是一丘之貉，最讨厌的是“现代评论派”的门徒也尾随鲁迅到了厦门，他们散布流言，兴风作浪，鲁迅不屑与这些败类为伍，1927年1月，他离开厦门前往北伐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当时的广州正处在革命的高潮之中，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党团员在北伐军中的骨干作用，加上全国人民的支持，北伐军节节胜利，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鲁迅到广州后和我党发生了密切联系，我们党派同志主动和鲁迅联系，送他马列的书和我们党的机关刊物，这时候鲁迅阅读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和刊物，他坚定地站在我党